

郭世佑◎著

记问沉浮： 近代史的求真之旅

JIWEN CHENFU
JINDAISHI DE QIUZHENZHILU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郭世佑◎著

记问沉浮： 近代史的求真之旅

JIWEN CHENFU
JINDAISHI DE QIUZHENZHILU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记问沉浮：近代史的求真之旅 / 郭世佑著.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

(学术随笔)

ISBN 978-7-303-11949-3

I. ①记… II. ①郭… III. ①中国—近代史—文集
IV. ①K25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8532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8006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邮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刷：北京嘉实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155 mm × 235 mm

印张：18.25

字数：272 千字

版次：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3.00 元

策划编辑：饶 涛 责任编辑：饶 涛 雷仕伟

美术编辑：毛 佳 装帧设计：国美嘉誉

责任校对：李 菡 责任印制：李 啸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0825

自序

我乃洞庭之滨益阳郊外的农家子弟，小时候就没有想过这辈子要做教师，遑论教历史。后来，拿到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我记不清当时是怎么对乡邻交代的，只记得有生以来还没有那样沮丧和难过。我曾反复在脑子里盘算：要不要去念这个师范学院以及历史系呢？如果不是想着要“吃国家粮”，提前结束“吃背米”的乡镇电影放映员的历史，我肯定就放弃了，娘亲就是希望儿子快去“吃国家粮”，抓“铁饭碗”。还有，如果不是有人说浪费录取名额就不准来年再考，我也不会去了，我毕竟还想赓续中学时的那份喜爱，还想读书。

带着“自古长沙多俊秀，且邀岳臂挽年华”的心境，穿梭于那些红砖楼，时间就不够用，不知不觉就到本科毕业了。只因为我侥幸属于当时为数不多平时考试成绩、教育实习与毕业论文“三优”的学生，加上我曾在湖南省首届大学生学术论文报告会的总结表彰会上，有幸成为全省历史专业的唯一获奖者，还成为当时为数极少的公开发表学术论文的本科生，师长的美言颇多，我就越过了中学历史教师那道门槛，在高教历史教师的行列候选。但我又是家中独子，别无兄弟姐妹，就主动放弃留校任教的资格，也放弃报考研究生的机会，只求任教益阳师专，返乡效力。4个年头之后，我就陪着双亲，抱着出生不久的女儿，迁居林增平先生亲笔推荐的湘潭师范学院。再过八年，林师病逝，人去楼空，我就接受杭州大学的

“引进”召唤，走近东海之滨，也算是弥补当年与东海舰队失之交臂的遗憾。5年之后，杭大与浙大回归一体，我奉命跻身5个校区巡回学术讲演之列，并在西溪、玉泉、紫金港三个校区之间奔波数载，然后听从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的感召，迁入京畿。

人生十九不如意，种瓜得豆时有发生。虽然担心做中学历史教师，却偏偏进了师范学院，还是历史专业；最后中学教师没有做成，却在大学糊口，这是我更没有想到的。做大学教师固然会比中学教师多一点面子和虚荣，但我知道它的难度与责任之大，远胜于中学教师。至于历史学，那其实就是一门贵族式学问，还是无底之洞，怎敢懈怠？

“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必也其听语乎？”我们这一代虽然赶上了戴好帽子的时代，名与利的花环随时都在诱惑我们，但那只是虚假的繁荣，任何名利标签都改变不了你的学术水准本身。当然，你不必把学术真当一回事，盯住名利就行，那么，虚假的就不是名利，而是学术了。福兮祸兮，只有鬼知道。需要长身体的时候，我们没饭吃；想读书的时候，我们无书可读，只见到处都是抄家焚书；当我们知道什么叫爱和被爱的时候，却不准恋爱，否则就是“道德品质有问题”。我们就成了物质营养与精神营养都很匮乏的一代，想要什么就没什么。据说那枚名曰“全国山河一片红”的邮票在前几年的标价就已高达数万元，在我看来，该票无论怎么涨价，都不算过分，因为它是以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岁月为本金和代价的。唯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在近乎文盲的家母精心呵护之下，我从小就养成了喜欢读书的习惯，考试成绩也无须双亲操心。就地升学进初中还没开始，家母就以她所特有的敏锐，托三求四，让我转到师资齐备的益阳县四中，避开那个让人分不清楚究竟是授课为主还是劳动为主的中学。当“贫下中农推荐上高中”的结果使考试成绩遥遥领先的我榜上无名时，是家母为儿子的上学权利奔走呼号的举动惊动了我的母校，使校领导单独给我一个升学名额。我就借助于所谓“右倾回潮”的空隙，以年级统考总分第一与接受上级文教局抽查时的数学满分，营造出高中时代的那份辉煌，回报娘亲和两次慷慨收留我的县四中，还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偷看《水浒传》《三国演义》《三家巷》《林海雪原》之类“黄色书籍”，如饥似渴。虽然

我的读书乐趣和境界还没有达到郭沫若那样的程度，趴在地上去大声呼喊：“大地啊，我的母亲”，也做不到阿基米德那样即使临危也不乱，当敌军逼近时，还能在阳光的沐浴下，兴致勃勃地思考他的数学题，但我也有我的书中之乐，还有书中之静，只要开卷，总会有益。无论当学生，还是做教员，都是如此。

不唯如此，我也知道学无止境的常识，而且随着人类的整体演进，知识在更新，学生在变化，“欲为师，永为生”，就成了我送给自己的座右铭。记得在潇湘某校任教时，由于那里什么事情都喜欢投票，搞群众运动，有位善良的年长同事就上门提醒我：“小郭啊，要注意走群众路线啊！”当时，我就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既不走群众路线，也不走领导路线。我既没有兴趣，也没有时间去串门，打扑克，钻桌子，我要读书补课啊。”他说：“你已经很优秀了，不必这样认真。”我继续实话实说：“我们这一代都是毛主席的好孩子，再怎么牛，都是过渡性的人物，成不了气候。我自己读书就很少，还教别人，我如履薄冰，稍不留神，就会误人子弟。如果我真的显得‘优秀’，那也只能说明别人不行，而不是因为我真的优秀啊。”

在知识的海洋里，历史学科属于第一股东；在人格的塑造中，求真的品质堪称构建人格长城的第一要塞。只因我的率真秉性符合历史学矢志求真的专业要求，28年来，我就在神州高校的史学偏房安营扎寨，虽有多次改行的机缘，毫不动心。其道理很简单，如果有一种职业让你每天都能面对一群充满活力与期待的聪慧青年，那么，还有什么职业是更值得尝试的呢？

谦卑与敬业乃任何时代与任何国度的稀有美德，今日之神州尤其是如此。若无谦卑，无以成敬业；若不敬业，无颜对父老。头脑不是被填充的容器，而是需要点燃的火种。思想的羽翼固然不曾招实引惠，而思想藉以获得自由。既然历史的误会把我同教师这个职业和历史专业连在一块儿，面对一个多少有些难度的职业和多少有些难度的专业，我就只能带着谦卑之心，一步一个脚印，默默而坚定地走向生命的终点。我不知道别人的路是不是规划出来的；我只知道我的人生之路就是走出来的，边走边看而

4 / 学术随笔

已。人生虽短，那却是两个永恒之间个性迥异的峡谷，存在的价值就基于存在本身，过程远比结果更重要。我有足够的理由把八年前留给浙大学子的临别赠言拿来自勉：燃烧的是激情，飞翔的是思想，说服人的是真理，征服人的是真诚……

浮云虽逝，往事如昨。岛夜无声，谨此为序。

2009 年 11 月 4 日晚初稿于台北圆山饭店

11 月 13 日晚定稿于金门技术学院

目 录

河洛捞真 /1

- “封建”“半封建”的理解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实质 /3
- 当代学术史的比较视野浅议 /12
- 清史编撰的两难抉择与希望 /17
- 史学论著撰述规则举要 /21
- 史学的规范与变革 /31
- 为有源头活水来 /34
- 过渡中的期待 /39
- 破坏历史记忆何时休 /47
- 民族英雄今安在 /54
- 思考：通向史识的桥梁 /58

近史追真 /61

- 中国近代史研究需要理论的突破 /63
- 如何看待“曾国藩热” /76
- 功过大小与“分成”的方法论误区 /79
- 为李鸿章辩一诬 /82
- 求实求真，贵在当真 /88
- 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 /96
- 是清末“宪政”，还是清末预备立宪 /101
- 孙中山、黄兴关系再评价 /107
- 梁启超的为人之道 /119
- 观念的脚步 /124

沧浪沥真 /127

- 慎把青春读明天 /129
- 博士生教育之患 /133

2 / 学术随笔

- 导师的权利 /141
- 大学是什么 /147
- 思想即自由 /152
- 应当珍惜“历史文化名城”的称号 /155
- 相聚的理由 /159
- 平凡的铺垫 /163

振铎留真 /169

- 言志不言谢 /171
- 欲为师，永为生 /174
- 职业的使命 /184
- 真正的强者 /190
- 自立者强 /192
- 真正的学术 /195
- 国难未纾道平安 /197
- 三字两语 /199
- 真诚的期待 /202

来去是真 /209

- 一夜春风松楸开 /211
- 李时岳：真正的学者 /214
- 另一种名誉 /224
- 心祭 /228
- 我的 2007 /232
- 我的 2008 /235
- 6 月的离愁，6 月的天空 /239
- 我知道 /243
- 当代大学生的是非观念与未来法律人的职业伦理何在？ /245

附 录 /257

- 历史研究不应充当“胜利者的宣传” /259
- 寻找我心中的冠军 /265

记问沉浮：近代史的求真之旅

河洛捞真

“封建”“半封建”的理解 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实质^①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我在《中华读书报》的“名家荐书”栏目为冯天瑜先生的新著《“封建”考论》写过短篇评论，但我可能不属于有的学者所说的“吹捧者”之列，我也不习惯于吹捧。任何学术论著都不可能完美无缺，而且常常见仁见智，《“封建”考论》中的个别论点自然还可以商榷，只因报纸的篇幅十分有限，我作为后学，还不便展开讨论，不过，我不认为冯天瑜先生的学风会有什么问题。我在《中华读书报》的短文结尾时还提到，尽管不是每一个读者都赞同他的论点，但他所提出的一些学术问题，还有他所做的学术史的清理工作，不是没有意义，不是可以随便绕过而视若罔闻的。^② 冯天瑜先生在很多前辈面前可能还算后辈，但对我来说，他还是我的前辈，他赠书给我，让我感动，所以就写一个评论表达后学的一份敬意和谢意。根据我对冯先生的

① 本文根据作者2007年10月11日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2007年中国古代史论坛“‘封建’名实问题与马列主义封建观”上的发言整理而成。原载《史学月刊》，2008（3）；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封建名实问题讨论文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② 参见郭世佑：《拨开云雾见新知——推荐冯天瑜先生的〈“封建”考论〉》，载《中华读书报》，2007-07-04。

了解，我倒相信他是一位朴实和严谨的学者，并不哗众取宠，这一点不应该有什么怀疑。

我是带着崇敬的心情，首次走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参加关于“封建”概念之名与实的研讨会。很多与会的前辈都说，他们是来学习的，我有点怀疑他们这种表达的真实性，而我真的是来学习的，我想多听听古史前辈是如何思考我国古代社会性质的，也期待他们把思路下延，为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贡献智慧。在我看来，不仅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与古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密切相关，而且前者所面临的问题可能更复杂，所能讨论的余地更大。当然，如果弄清楚我国 2000 年左右的古代社会即前近代社会的性质，对于把握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具有重要的意义，近代社会毕竟是根据前近代演变而来的。

我想谈三点感想：

第一，关于我国“封建社会形态”问题的研究

应该说，包括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何兹全等先生在内，许多前辈都做过努力，恐怕不能说他们都没有注意到“封建”的本义与“译义”之间的差异与变化过程，并非都是受“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影响，他们也是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某些实际问题，而且他们都是大家，无论是史料基础、理论素养，还是社会阅历，都不是我们这一代可以望其项背的。不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问，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不足。他们的弱点是什么？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史学论战与“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对各自的影响有多大？我们对秦汉以后的历史有没有“泛封建化”的倾向？“封建”一词究竟能揭示和概括我国秦汉以后两千年的什么社会特质？这些都值得琢磨。在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史学与政治因素纠缠在一起，包括斥“托派”，跟斯大林走的思维定式，难免影响前贤对我国古代社会形态问题的某些具体研究，革命家、理论家与政治挂钩，借历史的名义说话，势必掣肘历史研究的独立性与学术性，这是毋庸讳言的事实，有的前辈自己就曾反思过。应该说，适当回顾前人走过的学术历程，重新探索，不仅是可以的，而且是必要的。

第二，关于马列主义的“封建观”

有两个不同层面的研究对象需要予以适当区分：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

文本研究；二是对中国的历史研究。前者属于马克思主义研究，后者属于历史研究，尽管中国的历史研究也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但两者还不完全是一回事。历史研究中的问题固然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指导，但也需要从历史资料中去分析和归纳，用历史资料去检验马克思、恩格斯乃至列宁、斯大林的某些历史结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至于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主要是方法的指导，而不是其每一个结论甚至每一句话都能参与指导，更不能将马克思主义或列宁主义的文本取代具体的历史研究。在历史研究中，历史本身的论据往往比名人的某个论点更重要，为数更多的论据往往需要从史料中去提炼。

就文本研究而言，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各自的本意而言，他们对“封建”“封建社会”“封建主义”等词的理解有何异同？这些概念的针对性与适用性问题，是限于西欧，还是包括西欧之外的所有国家和地区？关于历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如今虽然争论各方都承认历史唯物主义，既强调事物的普遍性，也强调它的特殊性，但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究竟孰轻孰重的问题上，仍然各显神通，不能说只有承认普遍性重要的论点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否则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就指出：“在社会的历史上，自从我们脱离人类的原始状态即所谓石器时代以来，情况的重复是例外而不是通例；即使在某个地方发生这样的重复，也绝不是在完全同样的状况下发生的。在一切文明民族那里，原始的土地公有制的出现和这种所有制崩溃的形式就是如此。因此，我们在人类历史领域中的科学比在生物学领域中的科学还要落后得多；不仅如此，如果一旦例外地能够认识到某一时代的社会存在形式和政治存在形式的内在联系，那末这照例是发生在这些形式已经半衰退和濒于瓦解的时候。因此，在这里认识在本质上是相对的，因为它只限于了解一定的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的联系和后果，这些形式只存在于一定的时代和一定的民族中，而且按其本性来说都是暂时的。”^①

在我国学术研究中，在概念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现象：要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28～1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么过于纠缠概念，如同打词语仗，要么过于忽视概念的确定性，就忙于演绎和推理，两者都需要克服。就历史研究而言，中国古代社会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社会？“封建”“封建主义”等概念能否完全适用于西欧之外，特别是中国？都值得仔细推敲。还有，在研究过程中，有没有把“封建主义”一词泛化的现象？我看还是有，而且还比较普遍。有些作者习惯于把“封建主义”当作垃圾桶，把自己不喜欢的所有人和事都往里面扔，都叫“封建主义”。例如，把民国时期的袁世凯、蒋介石都叫作“封建主义”的总代表，近代的官僚叫“封建官僚”，军阀叫“封建军阀”，地主叫“封建地主”，“封建”的标签就像“主义”一样，取代具体论证。这里至少存在一个逻辑悖论：既然近代中国社会被认定为“半封建社会”，为什么不叫近代的官僚、军阀、地主为“半封建官僚”“半封建军阀”“半封建地主”呢？难道他们总是停留在古代，总是代表古代势力吗？久而久之，某些未经确证的概念就成了人云亦云的“集体无意识”，甚至成为学术推理的前提。

历史研究还存在一个方法论意义上的问题，对非西欧地区的历史解释是否一定要回归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西欧历史的研究结论？如果是，这算不算另一种形式的“西欧中心论”？值得讨论。

由此，我就联想到坚决打破“西欧中心论”来研究中国与东亚历史的日本汉学家沟口雄三的研究成果，可惜那还不曾引起足够的注意。沟口雄三在《作为方法的中国》一书中，就把中国作为理解世界向多元发展的钥匙和方法，试图建立一种新的世界性的思维空间，而不是以西方中心论为指标来描述和注释中国。他在自己与小岛毅所编日本学者论文集《中国的思维世界》所写的序言里，乃至在近期接受上海学者王少普博士的访谈里，一再强调中国历史不同于欧洲与日本的特殊性，提出许多值得深思的见解。他说：“中国的近代既不是超越欧洲的，也并不落后于欧洲，它从一开始就历史性地走了一条与欧洲和日本都不相同的独特道路。”而迄今为止的世界认识是“以欧洲标准为世界标准而建立起来的”，但毕竟还存在“以欧洲标准无法衡量的世界”，“中国正是这样一个基本上不能套用欧洲标准加以把握的世界”。他致力于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历史的研究，就是要“以中国为媒介而将欧洲的标准相对化，是为了使世界认识多元

化”。沟口雄三的见解应该多少能给我们一些学术启示，无论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还是研究中国近代的历史，恐怕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除非我们一定都要以西欧为中心。^①

沟口雄三还主张以 16~17 世纪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在他看来，“16~17 世纪，在中国发生了大的历史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在其后不久，为中国带来了辛亥革命。但是，我所说的变化，不是侯外庐先生曾提出过的、早期启蒙思想等那样的资本主义萌芽论之类西洋型的近代化变动。我所说的变动，是指以黄宗羲为代表的‘乡里公论’，即‘地方的公事地方办’的所谓民间主导的‘乡治空间’的成立、成长过程所显示的东西。”他还说，“这个过程，一再被用‘地方自治’的词汇说明，但是我不使用这个词汇，而使用‘乡治’这一词汇，因为‘地方自治’这样的词汇充满西洋风味，我想避开。在西方，如果说到‘地方自治’，包含有民间的通行自由等城市市民的政治自由，指的是作为权利被获得的东西。而‘乡治空间’，是绅、民交错的空间，其由来也不是权利的获得，而是来自于以相互扶助为主轴的、道德性的公共活动。这种活动，产生于 16~17 世纪，即明末，最初是作为救济饥民、弃儿，抚养老人、病人等个人的善行开始的。到了清代，扩大到修路、架桥、疏浚运河等公共事业，活动范围涉及经济、社会、政治等各个领域。这样的民间公共活动，是中国的特殊的東西。其后，经过白莲教、太平天国等变动，达到了蓄积武装力量（团练）的程度，势力增强。‘乡治空间’蓄积的力量，以镇压太平天国为契机，支撑起了‘为了地方的军队’（即湘军等），以后发展为军事上的‘省的力量’。不久，带来了辛亥革命。”^②

关于辛亥革命，在沟口雄三看来，它的影响与特点主要有三：一是终止了延续二千多年的王朝制度；二是各省各自发扬“省的力量”，形成独立状态；三是中央集权制崩坏，国内陷入分裂割据状态。这就意味着辛亥革命走的是分权化的道路。中国的这种分权化道路，与当时欧洲和日本所

① 沟口雄三：《方法としての中国》，东京大学出版会，1989；沟口雄三、小岛毅编：《中国的思维世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王少普：《如何重新审视中国》，载《文汇报》，2007-09-09。

② 王少普：《如何重新审视中国》。

经历的“由分权到集权”的道路是不同的。但是，让沟口雄三不解的是，欧、日等国的史家把“由分权到集权”的道路，视为普遍的近代化道路，而认为“从集权到分权”的中国辛亥革命则是落后的。他认为，“欧洲与日本，在近代以前实行的是封建领主制，在这种制度下，封建领地的划分使通行不自由，还有不平等的世袭身份制。因此，其近代革命主张废止领地制，主张四民（士农工商）平等。由此产生了自由与权利等主张。而在中国，从宋代开始，便没有世袭的士农工商的身份差别，形成了以实力为本位的社会，通行与商业是自由的。因此，也就没有类似欧洲与日本那样的争取自由与权利的斗争。”^①

对于沟口雄三的新见，恐怕还得从史料出发，予以认真回应，如果光用举手表态的方式，或用马克思等人的见解来辨明正误，无济于事。

窃以为，由于历史与现实一样，都很复杂，人们可以站在任何一个角度去观察历史场景，所得印象与描述结果就不太一样。人们还可以借用许多不同的背景知识与评判手段去解释那些场景，所得结论也尤其不同。从理论上或理想主义的角度来说，其中总有一种描述和一种解释最全面，最具有权威性，但在实际研究中，要找出这个权威并不容易。由于文字形式与实物形式本身的局限性，还有史料本身的主观性与研究者个人的主观性的双重制约，任何权威性的描述与解释既不可能是还原的，也不可能是全面的。研究者离历史的时空距离越远，“还原”与感受历史场景的能力就越小，而抛弃主观情感解释历史的可能性与可供选择的参照系数也越多，这本身就存在矛盾。由于求真乃治史者之天职所在，谁都可以断定自己是某个历史真实的代言人，同时又是缺陷不一的代言人。重要的不在于谁的历史描述与解释最全面，谁就最有资格拥有或垄断解释历史的话语霸权，而是在于谁的成果比较而言具有相对的说服力与学术生命力，在于各自不同的描述与解释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以偏赅全，以及彼此的互补性究竟何如。^②

第三，关于近代社会性质的理解及其他

主张以社会经济形态（有的简称“社会形态”）作为衡量社会性质的重心与依据，这在史学界已无什么争议，况且这种主张也符合唯物史观的基本

① 王少普：《如何重新审视中国》。

② 参见郭世佑：《21世纪中国史学遐思》，载《学术研究》，2000（2）。